

'93 海南 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主 编 廖 逊 符大榜
执行主编 邹良贤

海南省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南海出版公司

琼新登字 01 号



'93 海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主编	廖逊 符大榜
执行编辑	邹良贤
责任编辑	张爱国
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经销
照排	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海南农垦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19.37 印张
字数	670 千字
版次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书号	ISBN7—5442—0326—3/F·26
定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目 录

序.....	摩 逊(1)
海南:以城市带动农村.....	摩 逊(13)
邓小平同志经济特区理论的光辉	符大榜(29)
对海南扩大开放新举措的探讨	符大榜(31)
海南省国土开发建设总体布局	张金良(38)
质量与中国经济发展	冯远征(53)
优化结构 加快发展	罗时祥(59)
深化基础产业改革 消除结构失衡的体制因素 ...	范勇福(63)
论海南经济发展的阶段	
与主导产业的选择和转换	樊安群(69)
国家统一的经济意义	摩 逊(78)
海南少数民族的现代化	摩 逊(86)
关于当前海南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黎志毅(96)
琼海市区——海南省东部经济区	
中心城市的最佳选择.....	摩 逊 张山克 张金良(102)
海南开发区的概况、模式、特点与举措.....	王家雄(128)
'93~'94 海南经济形势分析	邹良贤 罗时祥(132)
我省当前经济形势分析及对策研究.....	邹良贤 罗时祥(150)
对加快海南商业发展	
问题的初步探讨.....	符大榜 王智猛 蔡 锐(166)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点问答·····	耶白堤(171)
市场体系建设 走出误区·····	王智猛(212)
市场经济与分税制·····	王智猛(214)
市场经济不等于“全民经商”·····	廖 逊(219)
海口保税区项目建议书·····	(225)
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构想·····	冯远征(241)
澄清中国“复关”认识上的几个误区·····	蔡 锐(248)
国防建设与海南特区开发·····	廖 逊(253)
海南港口开发的内容和措施·····	王家雄(258)
固定资产投资成倍增长	
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改善·····	邹良贤(261)
机遇与挑战——海南房地产业分析与对策研究 ·····	
·····	邹良贤(267)
谈谈海南的地价问题·····	廖 逊(286)
关于海南房地产发展的几个问题·····	罗时祥(290)
海南房地产业的现状与前瞻·····	倪定华 黄德明(295)
蓬勃发展的三亚市房地产业·····	黄德明(306)
海南房地产的投资环境·····	黄德明(311)
浅析房改对海南住房建设的影响·····	王家雄(322)
论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	符大榜 樊安群(330)
地方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管理·····	王智猛(335)
加速发展开放型市场经济·····	罗时祥(339)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指导，	
推动海南第三产业的发展·····	蔡 倪(347)
论海南在特区市场经济下的财税改革·····	黎志毅(358)
发挥地方政府在证券市场发育中的作用·····	王智猛(365)
加快和突出地搞好海南的旅游业·····	邹良贤(368)
国际旅游业与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黄德明(389)

发展旅游事业 振兴民族经济·····	邢关英(396)
加快海南旅游业发展的几点策略·····	王家雄(403)
转变观念,加速海南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	潘惠丽(406)
关于海南 20 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几个问题·····	邹良贤(412)
特区建设与领导决策·····	黄闻深(420)
信息化与工业化——反思《第三次浪潮》·····	廖 逊(423)
试论知人善任·····	黄闻深(433)
进一步拓展海南果汁饮料工业·····	王家雄(437)
海南加快营造新格局·····	耶白堤(439)
海南观众电视行为的调查与反思·····	罗 新(443)
论海南两元经济与教育发展战略·····	樊安群(451)
海南民族教育发展的新思路·····	罗 新(458)
教育事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黄闻深(463)
制定海南省民族经济立法的构思·····	邢关英(467)
社会主义有产劳动者的困惑	
——也谈“南方知识分子”·····	廖 逊(471)
转变传统观念 促进经济发展·····	罗 新(482)
黄振士对建立陵水县苏维埃政权的贡献·····	邢关英(489)
论黎族的祖先崇拜·····	邢关英(501)
论黎族的巫术·····	邢关英(505)
著名侨乡——文昌县·····	黄闻深(508)
海南岛是人类发源地之一·····	邢关英(514)
一种优势独具的信息载体	
——兼评 1993 年《海南年鉴》·····	张 凌(519)
提高地方综合性年鉴信息价值浅议·····	张 凌(529)
地方综合性年鉴资料刊载的若干思考·····	张 凌(538)
香港社会自治体系和公共咨询制度	
及其对内地机构改革的启示·····	范勇福(551)

琼台两岛经济发展道路之比较研究·····	张山克(559)
日本的经济周期预测及其启示·····	蔡 锐(578)
海南省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	
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纲要·····	詹长智(587)
市场经济与人口现代化·····	詹长智(594)
农村人口控制与社区发展·····	詹长智(605)

序 言

廖 逊

一、来之不易的高速发展

1993年,是《海南经济发展战略》中,第二个发展阶段的第一年,又是海南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第二年。

1992年高速发展的惯性,一直持续到1993年第一季度末。全国金融形势便开始呈现紧张的趋势,先后20多家省级银行备付金不足,自4月中旬起,许多沿海开发城市的内地资金开始被抽回。而正是在这前后,海南省委省政府逆风起飞,发动了一系列旨在扩大社会经济自由、缩小政府统制职能的攻坚战改革。这些改革,使海南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第二季度,打出了一个低潮中的小高潮。1992年我省国家银行首次出现的存款大于贷款、存差69亿元,在6月初上升到187亿元。等到7月份全国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之后,海南的内地资金也开始被抽回。但由于有了前3个月本钱,即使抽回的资金高达上百亿,也不曾“伤筋动骨”。4季度内地抽回资金趋缓,到了年底仍有60亿的存差。所以通观全年,海南建设资金相对充裕,没有导致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们认为,中央1993年的宏观调控是成功的,是改革开放15年以来第一次实现“点煞车、软着

陆”，避免了前几次的严重失控和大幅度振荡。1993 年我国继 1992 年，国民经济的增长幅度连续第二年高达 13%。而海南则是连续第二年达到 23% 左右，大约高于全国 10 个百分点。我们研究中心预测的“高潮时比别人高，低潮时也比别人高”，得到了胜利实现。

海南 1993 年成功的基础，是年初新改组的省委省政府在上半年奠定的。其中，4 月份前后推出的一连串的改革，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改革是：公司法人注册登记制度改革，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出口配额招标分配、土地使用权转让招标分配、基础设施股份化、国有企业法人相互持股、公开选聘厂长经理、取消财政预算内企业等等。海南决策人在本次经济周期中的表现，堪称上乘。而令人欣慰的是，这一系列改革中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是近些年来我们一再向省级领导建议过的。所有这些改革所围绕的核心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种经济成份平等竞争、“小政府、大社会”，更是我们研究中心 5 年多来，始终不渝地坚持捍卫、不遗余力地坚持鼓吹的。

1993 年海南全省国内生产总值 204.1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8%；农业总产值 88.5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31%；工业总产值 100.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38.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69.38 亿元（未包含洋浦开发区），比上年增长 94.5%，其中基本建设完成 85.59 亿元，增长 106.58%，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额从 1992 年的 24 亿元提高到 35 亿元；全年签订外商投资合同 3106 宗，合同投资额 64.23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81.1%，实际利用外资 9.72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82.7%；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29 亿元，比上年增长 93.7%。

二、展望前景,认清责任

从国内外和省内外形势的全局来看,1994 和 1995 两年,海南仍然有希望争取 20%左右,或者说高于全国 10 个百分点的较高发展速度。假如外部环境不发生太大变化,海南将在 1996、1997 两年,进入一个超高速度的发展时期。因为在今后 4 年,我们至少将面临 4 个重大的历史性机遇:

其一,1994 年 7 月三亚凤凰村国际机场通航,在此前后不久东干线高速公路将全线通车。机场一期工程完成后,将形成 150 万人次的年吞吐量,它势必要带动三亚及南部经济区乃至东部经济区国际旅游业的高速发展;

其二,近年内即将崛起的汽车工业。它已经在 1993 年为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立下了汗马功劳。改革开放 15 年,我国一直坚持“农、轻、重”的产业战略,有不少朋友甚至在多年批判“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染患了“恐重症”。然而这一时期,又偏偏是我国的重工业,达到了史无前例高速发展的年代。1993 年我国粗钢产量高达 8,868 万吨,仅次于日本,名列世界第二。与此同时我国人民的消费水平迅速提高,今后相当一部分城乡居民的消费热点,将转向住房、室内装修、电话和汽车,重工业时代即将到来。海南汽车工业历经 10 年的艰苦创业,正好赶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应运而生,不负“天赐良机”;

其三,1996 年 1 月莺歌海天然气登岛。这是中美两国十几年合作的硕果。只要天然气依照合同期限准时登岛,我们就必须提前建设好西海岸的有关产业基地,否则只能听任源源到达的天然气自燃,造成不可饶恕的浪费。所以,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会千方百计地加快建设。天然气登岛之日,就是西部经济区工业崛起之时;

其四,1997年600万吨炼油厂将正式投产。当年该厂带来的工业产值,就将高达140亿元,相当1992年海南全省的国内生产总值。目前,有关部门正在争取兴建更多的外资炼油厂,认为我省的特殊地理条件和特殊政策条件,均有利于兴建若干个这样的炼油厂。

仅此四个机遇,就将使我们有条件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后,创造出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好局面,更大规模地引进建设资金。海南的开发远景,将是石油、天然气、钢铁、橡胶加工、汽车工业成龙配套,带动各门类工业,以及农业、贸易、旅游业全面发展。海南将在工业化城市化不断加快的进程中,胜利地进入21世纪。

假如我们的研究人员到了今天,还不能预见到这样宏伟的发展前景,就不会理解我们所置身的历史环境,当然也就不可能把握自己的入生机遇。世界上有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像中国这样连续创造高速发展纪录的国家不多。中国有那么多省份,能像海南这样以经济特区的优势后来居上的,也仅此一个。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又兼作省政府研究室,这样纯粹的政策研究咨询研究机构,在海南也仅此一家。而我们的每一个研究处室,又都在各自擅长的研究领域中,默默地进行着开拓。这就是对我们时代和使命,最粗略的概括。

三、迎着商品大潮奋勇前进

1993年是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不同寻常的一年。正如符大榜同志在1994年初的一次全体人员大会上所做的精辟概括:“这一年内部吵得最凶,这一年成果也出得最多。”

所谓“吵得最凶”,就是因为商品大潮的猛烈冲击,一批又一批同志——其中不乏业务骨干和优秀人才——“下海”,由此势

必要引发一系列物质利益的变动和调整,引发一系列认识上的分歧和行动中的纷争。应当看到,这并不是我们研究中心一家的特殊现象,它是整个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必然要发生的普遍性问题。仅仅因为我们单位是一个人才最密集、权力又最小,最容易被企业界觊觎,并开展人才争夺的政府咨询机构,才造成了我们一些处室的阵脚不稳。

只有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国情的这一特点,我们才会正确地理解这种历史现象,才能正确地对待“下海”而去的同志。应当看到,向企业界输送人才,对于海南企业家队伍素质的改善,具有战略意义。这的确是我们研究中心对海南开发建设的一大贡献。

从我们研究中心的长远发展方向上来看,最终走向市场、走向社会,也将是大势所趋。事实上我们的海南年鉴社已经先行一步,前几年从只获得财政少数拨款的困难条件下起步,1993年又实行承包经营制,并在当年出版了全国第一部多卷集成本的年鉴,受到我国年鉴界权威人士的高度评价。

当然,即使是《海南年鉴》,也不是单纯的商业,其主要的人力仍然要投入编辑出版工作,做学问仍然是我们的主业。只有学问做好了,才能打开销路、占领市场。更何况市场经济绝不等于“全民经商”,商品交换的前提是社会分工,不能像“五·七”干校那样,人人都兼营数业。据我观察,研究中心的多数同志,恐怕也同我廖逊一样,并不具备“下海”经商的资质禀赋。与其东施效颦,不如扬长避短,老老实实地埋头治学,干好本职工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是专心致志、精遍一业的专业人才,而不是身兼数业、东张西望的“万金油”。所谓“不留神就成了百万富翁”,不过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现象。

我们研究中心之所以能在1993年“出得成果最多”,就是因为有一大批专心致志、刻苦钻研的同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同志们在物欲横流的环境中淡泊自守,义无反顾,坚韧不

拔，表现出了崇高的职业道德和理想情操。每当我看到这些同志，便由衷地感到自豪。

四、什么是科研机构的繁荣标志

关于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讨论最多的问题，也是全国各地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的同志讨论得最多的问题。自从马洪同志等老一辈决策咨询专家开创这项事业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几个艰难曲折的春秋。不久前在福州召开的全国研究中心主任会议上，大家的认识比过去更加接近：繁荣的标志不是上级重视不重视，也不是有没有被授予行政权力、拨发了多少经费，而是有没有涌现出一批得到社会公认的学术带头人。在这一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早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按照“一批”的标准，《三国演义》中的蜀汉方面并不成功，似乎是大大小小的政策性建议，皆出于诸葛亮一人之口。换句话说，刘备父子身边没有“智囊团”，只有一个“智囊员”，远不及曹魏、孙吴两家，那样精英荟萃、群星灿烂。

若干年来，研究中心领导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在海南占领一个又一个学科的至高点，想尽了一切办法。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为大家创造一个使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鼓励大家成名成家。我们的一惯做法：一曰“谁写作谁署名”，中心领导绝不掠人之美；二曰：“谁懂行谁答疑”，由最熟悉情况的同志直接面对省府首长，中心领导绝不做“二道贩子”；三曰“谁有了好的创建、好的思想，都向报刊舆论界推荐”，多为同志们做宣传，中心领导绝不忌贤妒能；四曰“长江后浪推前浪”，鼓励同志们青出于兰，中心领导也随时做好被超过的思想准备，以保证省领导能够得到省内最优秀的人才。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少不了各种各样的事务性工作，每个人都要准备做出各种贡献，但是中心

领导必须随时想到每一个研究人员的发展前途，不能叫人家单纯“跑龙套”。

正因为我们几年如一日地这样做，才使同志们感到“报国之门”。所以，同样是博士、硕士，同样是中级职称的专业人员，在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成功的概率就要比别的地方高。而且有不少同志“出将入相”，既能在研究中心著书立说，又能到行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还能到企业界纵横驰骋。平心而论，这些都同我们研究中心的特殊环境分不开。有人称我们为“海南第一人才库”，固然是过誉之词，却也不是全无根据。我相信只要我们长期坚持下去，定会取得更好的效益，又为海南培育人才，又使每一个在研究中心工作过的同志，都能留下美好的回忆。

五、关键在于保护知识产权

在保证人才脱颖而出的四条当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坚持“谁写作谁署名”。要想保护知识分子的劳动积极性，就必须保护知识产权。

个人是知识的载体。不论是哪一个学科哪一种门类，哪一种学问哪一种技艺，有人掌握就存在，没有人掌握就不存在。图书馆藏书万卷，没有人去读犹如废纸。邓小平之所以要把“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并提，就是因为二者不可分割。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生产力。

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在我们研究中心除了为省府首长起草的文件和少数内部调查报告之外，一般都是尽可能地坚持个人署名、公开发表。即使是集体创作，也要写明谁主持，谁执笔，谁参加了讨论。这样做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益处：

其一，个人名望是集体的财富。越是好的报告、好的文章，越是需要让读者知道谁是作者。任何一个有影响的研究机构，都

必须是人才辈出，接连不断地推出新人新作。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向《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学习，一百零八位英雄，人人有个性，个个有绝活。宋江身为第一把手，文武两方面都才俱平平，他的“特异功能”在于能够以崇高的道德理想，团结众多身手不凡的英雄好汉。假如其他一百零七全是“龙套”、“马仔”，他宋江又有什么可威风的？要的就是“鹰击长空，鱼翔潜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要的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仅仅为了我们的集体，也要求每一个研究人员，都争当“有名英雄。”

其二，只有个人署名，才能增强每一作者的责任心。文章、报告一经公开发表，就要接受广大读者的监督批评，免不了挑肥拣瘦，数黑论黄。粗制滥造的东西，白纸黑字，昭示天下，赖也赖不掉，不仅受时人贬斥，还要受到千千万万后人的指指点点，远远胜过我们某一个领导人的主观判断。我们也因此可以把领导人的审阅工作，减少到最低限度。既然是个人署名、文责自负，就大可不必让领导字斟句酌。

其三，只有个人署名，才能有效地防止少数人的智力剥削。在旧体制僵化模式下，最常见的一种社会不公，就是少数权势者，少数所谓“理论权威”、“学术名流”盗名欺世，打着“集体主义”的金字招牌，压榨“小人物”的千思一得。这种丑恶现象古来有之，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例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19 世纪的法国作家大仲马，他一生著述繁多，时至今日仍然受到普遍的欢迎。我小时候也曾是他的崇拜者，直到有一天我在一部民国年间出版的译著《西洋文学史》上，发现他的人格低下。大仲马仗着手里有几个钱，竟然雇佣了二十几位孤寒之士替他写作，300 多部戏剧、小说中只有一小部分，才完全属于他的个人劳动。尽管这桩公案早在 100 多年前就已了结，但是仍然只有大仲马一个人做了“有名英雄”，其余的人统统做了“无名英雄”。那些穷书生本来就一无所有，大仲马本来就名利双收，可到头来还是被这个无

耻之徒一人独吞。只有极少数专门研究法国文学史的人，才知道那些穷书生的姓名。很可惜，这种现象今天远未绝种，能够像我们研究中心这样做的，只是极少数单位。希望各位同事能够懂得珍视。

其四，只有坚持个人署名，才能识别尸位素餐的“南郭处士”。《韩非子·内储说上》中，有个“滥竽充数”的典故：“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悦之，廩食以数百人。宣王死，王立，好一一吹之，处士逃。”我们主张个人署名，就是为了“一一听之”，逼得“滥竽充数”者走投无路，唯有一逃了之。旧体制僵化模式的罪过，在于它总是帮助懒惰的人剥削勤劳的人，总是帮助狡猾的人剥削老实人，总是帮助横蛮无理的人剥削克己复礼的人。“大锅饭”制度，真可谓“南郭处士”的天堂。而有了“南郭处士”的天堂，就没有“千里马”的天堂。

从1988年一建立研究中心，我就不停地讲“知识产权”，不停地讲“成名成家”，但总是感到曲虽不高，合者甚寡。直到一批同志去兄弟厅局当领导，另一批同志“下海”经商，才知道是因为志向不同。现在好了，大家各就各位，各奔前程，留在研究中心的同志，总该专心做学问了。知识产权该发挥威力了。

六、只有专心致志，才能学有所成

80年代以来，“实现个人价值”，已经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就我个人理解，所谓“实现个人价值”，特指“个人价值的最大化”，既不能大才小用，也不能有才不用。据我观察，造成“大才小用”或“有才不用”的，往往不是处长们，而是我们的研究人员自己。明明一年可以写10万字，偏偏只写一二万，这算不算“大才小用”？明明可以专心治学，偏偏要去吃吃喝喝、玩玩耍耍，这算不算“有才不用”？遍观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像海南

这样报刊多、作者少的，唯独我们一家。这样优越的写作条件，恐怕只有在 30 年代的上海才有。当今内地的报刊，专业和业余的写作队伍，到处人满为患。我们既然已经付出了背井离乡、远走天涯的代价，为什么不珍视这来之不易的机遇呢？

两个多月前，我收到了辛荣耀同志送来的新著《海南：金融改革分析与运作》。这本书收集了他来海南后，写作的 40 多篇文章，计 30 万言。在此之前，他还出版了《特区金融论》和《海南：开放金融与证券投资》两部专著。其中的第一部专著，曾经在我们研究中心首开个人出书纪录。如今，他不仅是身处灯红酒绿的大特区，而且是身处财源滚滚的金融界，可是人家硬是能够静得下心来做学问！这种勤奋著述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大家很好地学习。对于这个同志，研究中心的“老”同志都是熟悉的。他并不属于人们心目中的那种文思敏捷、才华横溢的“天才”人物。我们不难想像，他每多写 1000 字，就意味着要少看一部电视剧，30 万字就是 300 部，再加上另外两部专著，让我们大家算算看，人家对海南的开发建设，付出了多少心血？

做学问，就是要有这种辛荣耀精神。不要等到将来人家著作等身，再去犯“红眼病”。看上去最笨的人，往往最聪明。做学问，老实就是最大的优势。没有这种精神，怎么能达到个人创造力的极限？不达到个人创造力的极限，又侈谈什么“实现个人价值”？曹孟德煮酒论英雄时，批评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看看我们这些知书达礼的知识分子，究竟怎样对待人生中的大事，怎样对待人生中的小利。

值得引为光荣的是，将近 6 年来我们研究中心没有一个人，写过一篇主张计划经济的文章。特别是在前两年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如此光荣纪录的研究机构，在全国也屈指可数。然而口头上赞成市场经济，并不等于在实践中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市场经济

就是生存竞争，优胜劣汰。在市场竞争的无情法则下，根本容不得三心二意从业者。只有专精本业，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岁月里得到回报。只有在本业经受得起残酷竞争了，才敢去兼营其它行业。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体育锻炼、艺术欣赏、社交往来、乃至衣食住行、饮食男女，都要服务和服从于我们的科研事业，服务和服从于“个人价值实现的最大化”。这同参加任何一项体育比赛的运动员，毫无二致。所以真正有雄心壮志的人，是那些最舍得本钱做大事业的人。心甘情愿地节俭创业，心甘情愿地把今天能够实现的享受推迟到明天，形成时间、精力、体力和资金向事业的高度集中，高积累，高投入。把一切有损于事业的内外消耗，都减少到最低限度。只有无情地要求自己，才能严肃地要求别人。否则我们凭什么去“实现个人的价值”呢？

身为研究人员，身为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争分夺秒，博览群书，好学深思，锲而不舍。有些同志总是担心省府首长不重视，我的看法却不同：最可怕的是，省府首长询问之时，我们回答不上来。

七、不拘一格降人才

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就要不拘一格地发现和培养人才。不仅研究人员中可以出人才，政工、行政、后勤、服务诸方面，也可以出多种多样的人才。

研究人员可以是科班出身，也可以是自学成才。当然为了保证工作质量，我们一般不招收自学者来中心工作。我只是想说，从事政工、行政、后勤、服务工作的同志，假如有志于科研工作，又肯下苦功夫读书写作，自学成才的大门是向他们敞开的。只是，我们要下更苦的功夫，更多地集中精力，既要方法对头，又要比受正规教育的学人多熬些年头。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区别